

# 农民与反封建

王小强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中，地主的盘剥，专制国家的掠夺，特别是皇亲贵戚、土豪劣绅对土地的大规模兼并，总是使以小块土地为生的广大农民日益贫困破产，流离失所，濒临绝境。“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悲惨境遇，迫使农民不得不多次拿起武器，为了生存而斗争。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少有的。农民在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中，表现出劳动人民不畏强暴的气概，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谱写出阶级斗争的悲壮诗篇。

但是，所有的农民起义最后都失败了。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他们创造不出任何新的生产方式来代替封建的生产方式，政治上也不可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郭沫若称陈涉吴广、赤眉、铜马、黄巾、李密、黄巢以及其他早期农民起义，“都是‘取而代之’主义者”，说“他们受历史条件的规约，不能超脱出封建时代的意识”<sup>①</sup>，是很有道理的。就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能够提出土地要求的农民起义，往往也只是要求恢复、巩固那种男耕女织、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而已。但是，这种自然经济，“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一切关系和个人的齐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有可能从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整体各个部分发生同等的作用。”<sup>②</sup>也就是说，以家庭为单位、以家长为轴心的自然经济，不仅是封建生产关系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牢固基础。它形成对家长制权威的社会承认，形成对个人权力无限崇拜的天然土壤。这种自然经济不仅使封建专制主义的行政权力成为决定性的社会因素，并且以这种行政权力作为自身存在的依据。所以，尽管农民起义客观上冲击着

---

① 郭沫若：《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序〈蔡文姬〉》，见史绍宾编：《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第五〇页。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六九七页。

封建制度的根基，农民对土地的再分配要求往往动摇了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可是单纯的平分土地，并不能带来高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等贵贱、均贫富”的最高理想，也决不能使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制度的束缚。

既然农民起义的经济要求超不出小生产的范畴，那么在政治上，农民起义就不可能提出彻底砸碎封建枷锁的要求，农民的政治觉悟就不可能超出封建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范围。这也是由农民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允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结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sup>①</sup>显而易见，倘若真的按照这种小农的世界观去改造世界，那么所得到的，也只能依旧是专制统治的封建社会。

在我国历史上，农民虽曾多次通过起义和暴动，不同程度地推翻了旧的封建统治者，建立了“新”政权。但是这些政权却无一例外地蜕变成封建统治的工具。这种悲剧性的蜕变，是历史的规律。它并不以革命者的出身和品质为依据。譬如：雇农出身的陈胜，贫困时声称“苟富贵，无相忘”<sup>②</sup>，做了王以后，就把来看望他的穷哥们杀掉了。朱元璋幼时孤无所依，削发为僧，参加红巾军后英勇善战，平易近人，他的军队纪律严明，每克敌城，都揭榜禁剽掠，深受百姓和士兵拥戴。可是在他作皇帝的三十年间，不仅几十次残酷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而且在朝内大肆杀戮，从国公列侯到文人学者，前后纵杀十几万，把明朝的开国元勋、功臣宿将几乎杀尽。吴晗说他“野蛮残暴的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帝王。”<sup>③</sup>就连太平天国这样伟大的农民起义，也同样是一方面向往着“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sup>④</sup>的平均主义乌托邦，一方面却又颁布《太平礼制》，用“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说为指导，建立了一整套森严烦琐的封建等级制度。所有农民起义无一幸免的失败证明，农民起义不可能彻底推翻旧制度、建立民主政权，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情况下，农民战争即使胜利了，其政权的性质也必然要发生蜕变。

## 二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才真正有了成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六九七页。

② 《史记·陈涉世家》。

③ 吴晗：《朱元璋传》第二五九页。

④ 《天朝田亩制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I》，第三二一页。

功的希望。无产阶级的领导不仅是决定革命胜利的关键，而且是决定革命性质不同于旧式的农民起义的关键。中国近代大机器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的成长，使革命有了全新的意义。

但是，旧中国的新生产力是极不发达的。我们党成立之前，中国只有近代工厂一，七五九家，工人五五七，六二二人<sup>①</sup>。一九二四年，全国无产阶级才发展到一八〇万人左右<sup>②</sup>。直到抗战前夕，“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sup>③</sup>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状况，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命运作出了历史的规定：革命的主力军还是非新生产力的代表——农民。

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沉重压迫，已使广大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奋勇斗争。鸦片战争以后的平英团、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运动，就是这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反映。无产阶级的领导，使旧式的农民起义变成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变成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不过这场革命，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那种在资本主义充分发达条件下爆发的革命。毫无疑问，它是新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但它所以能迅速地发展壮大，弥漫全国，则又是专制制度压迫农民、使农民投身革命的结果。在这点上，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相类似，发生于“一种可以实现‘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联合的环境中”<sup>④</sup>。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工人更少，农民更多，中国无产阶级如果不能把自己变革生产方式的要求与农民平分土地的愿望历史地统一在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目标下，和农民戮力同心、并肩战斗，无产阶级就不可能谋得本阶级和全体人民的解放。所以，我们说无产阶级的领导，首先和主要的就是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我们说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首先和主要的就是和农民运动这个最大的实际相结合。王明一类“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失败和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胜利，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英明论断：“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sup>⑤</sup>“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sup>⑥</sup>“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sup>⑦</sup>。（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中国革命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的国际环境中，并且有无产阶级领导所赋予的全新性质，决不能等同于旧式的农民起义。但是旧中国十分有限的近代工业，仅分布于少数沿海城市和交通枢纽，内地广大农村的经济生活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可是在我国为数甚少的无产阶级队伍中，很大一部分工人并没有直接

① 见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五六页。

② 见邓中夏：《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党史资料》一九五三年第四期，第八页。

③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二〇页。

④ 列宁：《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七二六页。

⑤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五三页。

⑥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七二页。

⑦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五二页。

参加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广大远离城市、远离近代文明的边区和内地农民。这些农民，一方面受野蛮的封建压迫最深重，因而富于反抗精神；另一方面又很少接触新生事物，他们的思想深受小生产者经济地位的局限。千百年来，他们在自然经济的生活秩序中与世隔绝地生存着。他们的聪明才智被野蛮的专制制度所摧残；他们的精神生活为繁重的简单劳动所窒息。当然，在这次革命中，他们与过去的农民一样，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表现了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他们所建树的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是任何人也不能抹煞的。没有他们的浴血奋战，就根本不会有革命的胜利。但是也应指出：农民，作为受剥削的劳动者，有反封建的一面；作为小私有者，则又有它散漫、自私、落后、保守的一面。并且，它的自私和保守，是与小生产的狭隘性、与某些封建社会的旧传统紧密相连的。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却不是像无产阶级那样有高度自觉的、彻底反封建的革命力量。农民固有的“等贵贱、均贫富”的平等观，与资产阶级鼓吹的建立在商品等价交换原则基础上的“平等权利”有本质的不同；与无产阶级建立在现代化科学和大生产基础上，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平等观更是大相径庭。农民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平等思想，是出于小生产者对破产命运的恐惧，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乌托邦式的空想。旧式农民起义的历史经验证明，这种空想是绝对不能实现的。因为它在实践中并不妨碍小生产者掌握一定权力之后，不期然而然地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过去，反过来重新用封建专制统治人民。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不断克服农民意识的影响，才能使农民在这场革命中避免重蹈历史复辙的厄运。

我们党历来重视教育农民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与官僚主义、家长作风、绝对平均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流寇思想等不良倾向作过坚决的斗争，并在一系列著作中，对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过系统的分析和批判，提出“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sup>①</sup>的问题。我们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从理论上作了极为深刻的分析，并十分严肃地指出“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sup>②</sup>随着革命战争日趋胜利，教育农民的问题也就越突出、越严重。一九四四年，毛泽东同志把郭沫若撰著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推荐给全党，并建议郭老再写太平天国的经验，提醒全党注意农民起义蜕化变质的历史教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干部，进城以后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提出：要进一步进行革命，“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们党所走过的道路，既是依靠农民、发动农民开展革命斗争的过程，也是不断教育农民、改造农民，不断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过程。中国革命正是由于我们党成功地领导了农民运动才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革命的胜利以不容置疑的事实说明，虽然我国无产阶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六八页。

②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一九五三年版，第九九三页。

级人数很少，但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坚强的党。这个党是能够发挥无产阶级的先锋作用，领导全体人民彻底完成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的。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充分肯定党的领导作用、充分肯定农民对革命的伟大贡献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更进一步地认识到，社会各阶级力量的对比、革命队伍的组织成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政治觉悟不能代替广大农民所固有的落后的小生产者的阶级属性。我们不能设想农民在革命中只表现出其反封建的一面，而不表现出其狭隘、自私、保守、落后的一面。中国革命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并不等于说，农民作为主力军不会对革命发生多方面的巨大影响；也不等于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就彻底完成了。

我们知道，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旧式农民起义的关键在于，无产阶级不谋求某一阶级或某一政治集团的私利，她所要求的是全体人民的解放。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目的不是改朝换代，拥戴、推举一个“好皇帝”，而是要赋予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要实现“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的民主，“为了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而把民主发展和扩大到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地步。”<sup>①</sup>可是要做到这一点，绝非轻而易举。在我们这样一个前资本主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即使经过了一次相当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也不可能马上把有几千年传统的封建意识形态都扫除干净，更不能使广大农民立即改变小生产者狭隘的经济地位，从而使他们摆脱封建宗法思想的束缚，成为坚持人民民主制度的自觉战士。事实恰恰相反，正因为封建思想残余的存在，农民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存在，使得建立起一套完整有效的人民民主制度，让全体人民不是在名义上而是在实质上当家作主，成为一项十分艰巨的长期任务。

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创造了劳动人民彻底解放的先决条件，但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还没有结束。尽管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已经培养起高度自觉的民主作风和民主传统，可是现实的历史条件，使我们还不能马上实现劳动者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人民民主。历史给我们在今后的革命进程中，留下了一个在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继续反封建、建立并健全民主制度的艰巨任务。这个任务具有极为深刻的政治内容，它反映了实现无产阶级政治要求的可能与现实的矛盾，意味着革命队伍内部在建立何种政治制度的问题上，不同思想、不同世界观之间将会有长期的斗争。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一个具有关键性的、决定革命成败的政治任务。因为没有人民民主制度，人民当家作主就很难保证。鉴于旧式农民起义胜利后必然蜕化变质的历史教训，这个任务完成不好是十分危险的。毛泽东同志之所以向全党推荐《甲申三百年祭》，实际上正是在意味深长地告诫我们：这场以农民为主力军的革命，一旦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不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逐步实现人民民主，也同样有重演旧式农民起义历史悲剧的危险性。

---

① 列宁：《反对修正主义》第三六〇、三五九页。

## 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土地革命，是满足农民得到土地的要求。这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我们党灵活运用马列主义的结果。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我们紧接着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社会生产力也取得了很大发展。现代工业的成长壮大，日益需要现代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与之相适应，不断否定着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生产力的发展在经济上要求用科学和民主的方法管理经济，反对长官意志、反对滥用行政权力；政治上，也给我们提出了反对家长制、逐步实现人民民主的客观要求。历史的进步使革命的进程早已远远超出了传统农民起义所能想象的范围。随着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我们的干部成为当权者这一政治地位的深刻变化，扩大民主生活，反对那种“和中世纪制、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sup>①</sup>的斗争，也就具有了更为严重、更为深刻的政治意义。它将决定中国革命的前途。

在同是农民众多的俄国，列宁曾为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提出如下任务：第一，“用全力争取农民起义的彻底胜利。没有这种胜利，不管是从地主那里‘剥夺土地’，或者是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都甚至是根本谈不上的。”第二，“不把政治制度彻底民主化，不确立共和制度和真正地保证人民专政，无论是保持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或者是采取什么更进一步的措施，都是连想也不能想的。”第三，“为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sup>②</sup>关于第二个任务，列宁还特别警告人们说，“谁想不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就必然会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是荒谬的和反动的结论。”<sup>③</sup>

建国以后，在发展生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们党曾经为政治制度民主化作了大量的工作。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的“八大”告诫全党：“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sup>④</sup>，并且一致决议，把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生活和健全法制，作为全党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这是我们党忠实于列宁主义的表现。

其实早在“八大”以前，我们党内如列宁所说的那种前资本主义性质的官僚主义倾向就已经相当严重。邓小平同志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曾痛切地指出：“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sup>⑤</sup>；他们“骄傲，专横，鲁莽，自作聪明，不同群众商量，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为了自己的威信而坚持错误”<sup>⑥</sup>；“他们夸大个人的

① 列宁：《论粮食税》，《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五五一页。

② 列宁：《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一〇卷，第一六二——一六三页。

③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五九四页。

④⑤⑥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七五页、第八一页、第七九页。

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关系颠倒过来，完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做种种违法乱纪的坏事。这是一种很恶劣的反人民的作风，这是旧时代统治阶级作风在我们队伍中的反映。”<sup>①</sup>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战争中出生入死的革命干部为什么会有反人民的作风？旧时代统治阶级作风为什么会在革命队伍中有所反映？这种反映是偶然发生的呢，还是有某种潜在的必然性？

在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我们“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所构成的”<sup>②</sup>。截至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我们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党组织中，有百分之八十六的成份不是无产阶级，农民成份竟占了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九点一<sup>③</sup>。毫无疑问，广大农民党员经过长期斗争的考验，在党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下，是完全可以转化成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但是也不能否认，“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份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sup>④</sup>这就使得“打天下、坐天下”的农民意识、平均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小生产者封建家长制的作风，在我们党内有着非常广泛的市场和非常深刻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传统的封建思想和封建的伦理道德往往能够通过落后的农民意识曲折地反映出来，在这些农民意识中找到它们栖身的土壤。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狭隘地把革命仅仅理解成“江山易主”的人，是很有一部分的。他们往往以人民的“恩人”自居，一朝权在手，就不再想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里，的确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敲榨勒索，行贿受贿，徇私枉法，贪污腐化，扩大特权享受，大搞裙带关系，用封建家长式的统治使人民处于无权地位，甚至用捆绑吊打之类的手段来迫害群众。当然，对这些人要作具体分析，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如何加强教育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类似旧式农民起义蜕化变质的现象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不止一次地出现，并且不断发展，确实反映了某种危险的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党所领导的工农政权，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同时，更有一个防止政权向封建专制蜕变的严重任务。这个任务，在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水平没有很大提高的一定阶段，甚至比防范资本主义还要严重。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蜕变”，当然是指少数个人野心家和所谓“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如果在他们领导的地方或部门实行封建式的统治，就不再代表人民了，他们会以新的统治者的身份，与广大人民群众重新处于对立状态。所以，我们说“蜕变”，就像说旧式农民起义必然向封建专制蜕变一样，丝毫不意味着广大出身于农民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干部主观上倾向于封建复辟，相反，封建复辟是与劳动者的根本利益相抵牾的，也是广大决心跟无产

①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八一——八二页。

②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八三页。

③ 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九八页。

④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七九〇页。

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民所不能允许的。但是正如列宁在分析专制制度时曾经深刻指出过的那样，说：“‘专制制度仅仅代表各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是不确切的，或者说是错误的。专制制度满足各统治阶级一定的利益，部分地依靠农民群众和全体小生产者的得过且过的习惯，部分地依靠各种对立利益之间的平衡”<sup>①</sup>。在我们这个封建传统源远流长的国家里，党内外、特别是干部队伍中农民意识的严重影响，广大农民缺乏文化生活、缺少民主传统的现状，客观上确实造成封建家长制统治的方便条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怨天尤人，怪罪农民，是极不应该的。积极的态度是，在社会物质、精神文明日臻发达的同时，扩大民主生活，引导、教育人民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sup>②</sup>，“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sup>③</sup>这就更需要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续进行反封建残余的斗争，认真汲取历史上“农民政权”向封建专制蜕变的教训，坚决取缔封建性的特权，把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的暂时现象和承认封建家长制严格区别开来，用大气力创造人民参加国家管理的机会，使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逐步接受民主生活的训练。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干扰和破坏，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农民运动的“惯性力”。固然，许多年来我们是在和官僚主义、蜕化变质现象作斗争。但是，如果认识不到政权内部有一个可能发生蜕变的成份，把一种有阶级根源的历史现象单单当成外部敌人侵蚀的结果来防范，其结果，只能是斩草不除根，治标不治本。林彪、“四人帮”利用了我们一些同志在认识上的模糊，根本否定了我们党对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和改造。长期以来，他们打着批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幌子，在歌颂地主阶级法家人物的同时，别有用心地把农民落后保守的一面说成是革命的，无限夸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我们知道，列宁在俄国的历次革命运动中，总是把工人阶级作为领导力量派到农村去，领导农民革命。可是在林彪、“四人帮”嘴里，似乎唯独农民阶级才是最革命的阶级，一切工人、学生、知识分子、甚至革命干部（包括农民出身的久经考验的老干部）都必须到农村去，接受农民的再改造。这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他们一派歌颂法家、吹捧农民的鼓噪中，反动的平均主义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穷过渡”变成了消灭三大差别的良方妙剂；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被视为洪水猛兽，自给自足、闭关保守倒是天经地义；上级、下级是“君君、臣臣”，领袖和群众成了父子关系；封建的忠君传统是最激昂的革命阶级感情，封建专制的法西斯手段成了表现革命彻底性的标志……他们之所以这样明目张胆地肆意践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险恶用心，就是在拚命吹捧法家、美化农民的消极面的同时，使一切封建的思想和伦理道德在革命

① 列宁：《给“北方协会”的信》，《列宁全集》第六卷，第一四〇页。

②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九五页。

③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七一页。



外衣的掩护下席卷整个社会，造成一种“三忠于、四无限”的普遍社会心理，完全否定政治制度民主化，为把中国变成他们传宗接代的家天下铺平道路。

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根本否定了“八大”的正确路线，严重影响了革命的进程，使“反修防修”斗争，不仅没有和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封建家长制的斗争联系起来，反而自觉不自觉地冲淡了和放松了这方面的斗争。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推进和发展了党内外的民主生活，而是相反，一步步地把解放初期靠自觉建立起来的民主生活，用所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代替了。在一次紧接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党内外的民主生活经常得不到正常开展，人民的民主权利长期得不到法制的保护。于是，在领导干部一般不受人民监督的情况下，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封建性的特权越来越发展，封建家长制的作风越来越严重，毛泽东同志一再倡导的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越来越少，人们除了谨小慎微地力求不犯任何细小错误之外，其他什么也不敢干、不敢说、甚至不敢想了，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健康的党内外民主生活也就越来越不可能了。

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了旧传统势力在革命队伍中的巨大影响，破坏了我们党内外正常的民主生活，才能够篡党夺权、把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复辟决不是偶然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为什么有几百万、几千万的红卫兵造反夺权？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他们精心排练的“敬祝万寿无疆”、山呼“万万岁万万岁”的闹剧？造成这种现象是有多种原因的，但是在中国，几个跳梁小丑为何有如此之大的能量？这的确是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历史的教训是多么无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年之后，当人民终于不堪忍受“四人帮”封建专制的暴虐统治，为了革命的前途而奋起斗争时，这群食人生番竟能动用军队、警察、民兵、法庭、监狱等全套的国家机器，血腥地镇压人民。天安门广场的鲜血告诉人们：革命政权的性质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无产阶级专政弄得不好，完全有可能被阶级敌人所利用，变成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痛定思痛。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无不在深深地思索：我们久经战火考验的党为什么没有能使我们避免这场空前的浩劫？用什么办法才能防止封建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篡党夺权，改变革命政权的性质？——听听列宁的回答吧：

“人民需要共和国，为的是教育群众走向民主。需要的不仅仅是民主形式的代表机关，而且要建立由群众自己从下面来管理整个国家的制度，让群众实际地参加各方面的生活，让群众在管理国家中起积极的作用。”“——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国家避免君主制的复辟，使国家能够有计划地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sup>①</sup>。

我们亲身经历的沉痛教训证明了列宁的论断：在一个农民众多的国家里，倘若不彻底完成民主革命，是建不成社会主义制度的；而防止政权蜕变、保卫胜利果实的唯一途径，就是

---

① 列宁：《论无产阶级的民警》，《列宁全集》第二四卷，第一五三——一五四页。

走一条政治制度民主化的道路。那么是不是说，我们马上来个“全面民主”，就能万事大吉了呢？当然不是。斯大林说得好：“我们应当在生产力的发展史中而不是在人们的头脑中去探求自己的理想。”<sup>①</sup>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产物。如果不通过发展生产力根本改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贫乏状况，就实现不了真正的人民民主。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制度的变革，是以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前提的，而任何一种新社会制度的真正确立，也同样要靠生产力的发展来最终完成。既然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的过程，那么新制度的建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完成，只能是一个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前进的长期过程。

温习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回顾我国革命走过的道路，我们可以看出，在前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民国家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有两个平行而互相作用的任务：第一，集中全力发展生产力，用现代化的大生产从根本上改造落后原始的小生产、改变社会阶级力量的对比；第二，继续民主革命，把政治制度逐步民主化，防止政权性质发生蜕变，使人民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第一个任务是根本任务，是完成第二个任务的前提。但是第二个任务完成不好，也会巨大地反作用于第一个任务，甚至会使其“濒于崩溃的边缘”。所以，只有这两个任务都完成了，我们才可能真正建成社会主义。

今天，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异常紧迫的时候，我们要把九亿人民（主要部分还是农民）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调动起来，发挥出来，不使劳动人民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不可能的。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也必将意味着扫除一切封建残余，使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现。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的发展不仅为政治的改革创造着条件，更重要的是，它还将以无法抗拒的必然形式不断地提出政治改革的历史要求，推动、支持无产阶级继续民主革命的伟大事业。我们坚信，饱受剥削阶级残酷压榨的广大农民，是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教育，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彻底完成的。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我们只要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大力开展民主教育，创造条件，使人民得到民主生活的训练，向一切阻碍人民民主事业的传统势力作坚决的斗争，扫除封建家长制和皇权思想的残余，有步骤地把政治制度逐步民主化，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能顺利前进。

---

<sup>①</sup>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三二〇页。